

ADB I 政策研究摘要 No. 15
私营部门与中国

中国私营部门发展模型

赵 志君
金森 俊树

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有其特殊背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实际上在上一个世纪五十年代已经消亡。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倡为他人奉献的精神和集体主义。这种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积极的作用，曾使社会主义经济在一定历史阶段和某些特殊领域取得了奇迹。但是，就长期而言，这种精神违背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这就决定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无法取得可与资本主义经济同等水平的经济增长成果。

为什么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根据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拥有共同利益，并为实现它而努力工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合作的而非竞争的。共产党人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个人利益。工作激励来自于合作精神。

这些假设完全不同于起源于亚当·斯密的新古典经济学说。后者认为，人是自利的，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的本性，与其所受的教育及受教育水平无关。

对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实践极大地压制了人们对财富、消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这种意识形态和理论并没有激发人们为了共同利益更加努力工作，相反，人们在工作中怠工的现象很普遍。由此可见，经典社会主义的实践并不成功，共产党并没有完全兑现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诺言。

然而，在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至少有一条基本原则是恰当的，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看来共产党很清楚，如果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来满足人民们的衣食住行需求，就无法维护其自身政治利益，巩固政权。除了物质需求，人们还需要民主和自由。事实的确如此，中国的普通百姓从未放弃对美

好的生活的追求。即使是在商品需求被扭曲和私营经济被当成非法的计划经济时期，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没有消失，而**私营经济则在当时处于地下状态**。

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实践中的失败使一些共产党人重新审视他们追求的社会主义道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必须进行改革开放。在其领导下，中国从 1978 年开始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但对于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的道路，却始终存在争议。

实际上，世界上的改革模式有很多。从学术的角度，可简单地化分为两类，即**渐进式改革**和**“大爆炸”式（激进式）改革**。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策略，即以解决问题为着眼点的方式；与之对照，俄国采取的则是大爆炸式改革。中国改革的特点是，先从最容易的部分着手，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同时，为了减少改革阻力，必要时对计划经济时期的既得利益集团作出妥协，遇到困难时再想别的办法。

私有化过程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对现有国有和集体部门进行私有化，二是在保持现有国有和集体部门不变的条件下，创建新的私营企业（被称为“双轨制”）。中国政府采取了后一种办法，与前者相比，它比较渐进、平稳。在改革初期，私有化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尽管“开放”、“改革”和“竞争力”等词汇时常见诸于官方文件，但“私有化”却甚少提及。

但是，最近几年中国开始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2002 年，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国有企业资产的管理和处置。过去，省级政府仅仅是受中央政府委托的代理人，而现在，他们

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可以处置国有企业并将有关收益纳入预算收入。

受中央政府的鼓励，财政饥渴的地方政府纷纷开始私有化其管辖的中小型国有企业（据华南早报称，湖南省 90%的省级国有企业资产已经出售）。据国有资产管理局估计，80%的县级小型国有企业和 60%的市级国有企业已经私有化。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在过去 **26 年中达到年均增长 9%的水平**。私营企业由 1989 年的 90,000 家增加到 2003 年的 3 百万家，增加了近 33 倍；个体经济从 1247 万家增加到 2353 万家，将近翻了一番；外资企业从 1989 年的 15,919 家增加到 2003 年的 226,373 家，约增加了 14 倍。与私营部门的迅猛发展形成对照，国有企业从 1992 年的 155 万家下降到 2003 年的 105 万家，集体企业从 416 万家下降到了 163 万家。

私营部门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平均职工人数趋于下降。2003 年，私营企业的平均职工人数为 14 人，个体户平均只有两人，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平均职工人数高达 54 人。1989 年，私营企业的平均职工人数是 18 人，到了 2004 年，降低到了 14 人。而同期国有企业的平均职工人数相对稳定，除了 1992 年一度达到 76 人以外，保持在 49-56 之间浮动。还要注意，大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已经私有化。

虽然私营部门发展迅猛，但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并不是在公平的“竞技场”上竞争，他们面临的障碍非常多。例如，私营企业面临的交易成本很高，包括繁杂的行政审批程序、过高的市场准入门槛、不成熟的资本市场、较低的企业管理水平和政府部门缺乏信用。

很多宏观经济现象可以用私营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模型来解释。例如，“乡镇企业”曾被看成是新的有效率的群体，但是在经历了 80 年代的短暂辉煌后已经衰落。承包责任制下的国有企业命运相同，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时期的起伏，大部分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现在都**亏损严重或负有巨额不良贷款**。

本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调查为基础，分析了企业的目标，提出了一些假定，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的简单经济数学模型。按照该模型，得出了几个关于私有化过程中产出、投资和就业如何决定的命题。此外，在模型框架下讨论了企业剩余利润的决定，以及对银行部门的含义，分析了中国私营企业的数量和规模的决定问题。

模型的主要发现和含义如下：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企业追求的目标大致可归为三类：

- 利润最大化
- 销售收入
- 市场份额

企业间的行为或许有很大差异，但我们没有发现部门之间的行为方式有显著差异。根据模型分析，我们发现，与那些把利润最大化作为单一目标的企业相比，具有多重目标的企业倾向于以更多的对投资和劳动需求，生产更多产品。这与政府部门追求更高经济增长和提高就业机会的目标是一致的。

但是，与利润最大化单一目标企业相比，多重目标的企业由于利润较低，竞争力较弱。更糟糕的是，由于资本边际生产力低于成本，利润可能为负，企业因此可能无法偿还银行贷款，从而导致企业生存的基础被削弱，或是引起**银行部门的不良贷款**。换

句话说，国有企业资产通过负利润和高工资的方式实现了再分配。然而，这种分配与劳动对产出的贡献是不协调的。

本模型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私营企业数量迅速提高的同时，企业规模下降。影响企业数量的因素包括私有化、市场化、劳动和资本成本、进入成本和税率。

私有化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相对较低的劳动和资金成本、较低的准入成本都可导致私营企业数量的增加；同时，边际管理才能下降、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深化，进入成本和其它成本的降低则可导致企业规模减小。

模型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俄国激进式改革导致私有化了的国有企业突然的大范围崩溃，而渐进式改革在中国却取得了某种程度的一定成功。根据模型，私营企业的发展不仅有赖于私有化和市场化，还有赖于诸多其它因素，例如资金成本、劳动成本、进入成本、税率，特别是管理者才能。给定其它条件不变，企业越大，对管理者才能和技能的要求越高。因此，只有那些拥有适当的边际管理才能的企业才能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如果一个大企业的经理人才能很低，企业将亏损乃至最终破产。

俄国私有化了的国有企业之所以崩溃，其可能的原因就在于企业规模和管理者才能不匹配。我们知道，在改革初期，俄国的大部分私营企业是从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发展而来，因此需要很强的经理人才与之匹配。但大部分经理人只具备管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的经验，对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企业知之甚少，因此他们没有能力去经营大型私营企业。与之相反，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初期，中国已经通过私营企业培养了一大批与企业规模相适应的高水平的管理人才，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人

力资源储备，而且还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社会财富，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由于国有企业有很强的政治象征性，因此在改革初期立即对其私有化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和困难。中国的做法是暂且保持其名义所有权不变，对企业实行所谓的“**承包责任制**”。结果很多国有企业开始亏损。但是，与激进式改革不同的是，激进式改革中的企业亏损由私人承担，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中，企业亏损基本是由政府承担。

上述过程严重侵蚀了包括财政和银行在内的国家金融资源，政府负债逐步增加并逐步接近资产。一旦政府（包括国有银行）没有能力承担国有企业的亏损，私有化的加速不可避免。这就是所谓的“抓大放小”改革的背景。

总之，我们认为，这个模型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银行部门积极地、不断地进行市场化改革是一种必然选择，私营企业也需要提高市场意识，从而转变为真正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实体。